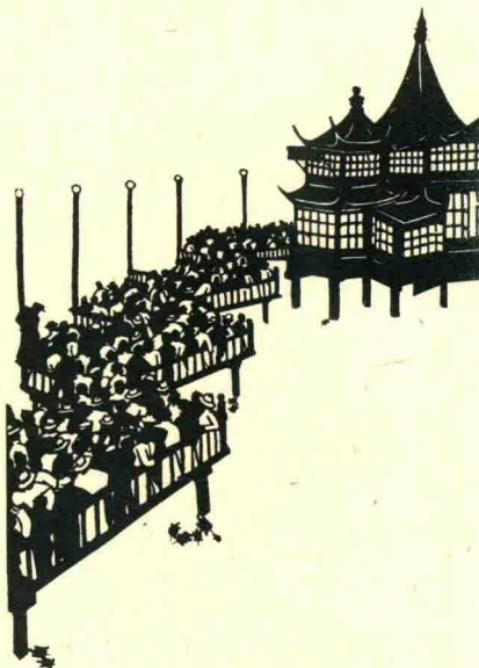




民国分省游记丛书



— 民国上海游记 —

冯仰操 编

海 上 行 旅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民国分省游记丛书

海
上
行
旅

民国上海游记

冯仲操
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行旅：民国上海游记 / 冯仰操编.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 - 7 - 5651 - 3430 - 2

I. ①海… II. ①冯…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民国 IV. ①I2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6977 号

书 名 海上行旅——民国上海游记
编 者 冯仰操
责任编辑 向 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1 - 3430 - 2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出版弁言

《民国分省游记》是以省及省级市为单位,用游记之形式来呈现民国历史文化生态之丛书。选文首重史料性,同时兼顾文学性与科学性。科学艺术类考察记,凡记载社会生活较丰富者,均酌情收录。故本丛书所收录之游记,并非皆是传统意义上之文学性游记。

丛书之推出,既想以史料之展示,来复原一些消失之历史细节,也想与读者一道重温先贤观察社会历史之角度与情怀,因此,丛书之核心是呈现细节与情怀,在内容上并不求全。

在整理游记资料时,我们确定了如下一些原则:

一、繁体字、异体字改为标准简化字,原文误植径改;模糊难辨之字,以□代替。

二、当时的习惯用法,如“那末”“计画”“莫有”等,今

人理解不致产生歧义，故一仍其旧。

三、文中标点，在基本尊重原文的基础上，按今天的使用习惯酌情做了更改。

四、特殊名词术语和需要注释的词语，在脚注中以编者注的形式略作说明。

希望由此呈现的文本能得到读者的认可。

民国二十年，张元济赠傅增湘诗有句云：“我为古人
蘄续命，更从新法试留真。”本丛书之出版，亦同斯旨。
“续命”，是通过“重游”来克绍先贤之徽猷，承续文化之
慧命。“留真”，则非仅为册府增一写真集，亦以待续命
之人。

尽力而为，总是想多留几粒结缘豆。区区此意，读
者鉴之。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国游记中的上海印象

冯仰操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伴随着《上海滩》的歌声，我有了最初的上海印象，那是一个冒险与传奇的空间，有法租界与夜总会，也有黑帮和大亨。多年后初遇现实中的上海，只是匆匆的一瞥，到处耸立的高楼，不息的车流，却倍感陌生与压抑。随着见闻略丰，读书渐多，累积了众多上海印象的碎片，其中，那岁月斑驳的民国上海依旧是最让人着迷的。

民国，略带沧桑的时代，上海，备显迷离的空间。那时，哪些人来过这闻名中外的魔都，在他们悠闲的凝视或紧张的浏览下，呈现了怎样的城市景观。带着这些疑问，我翻开泛着霉味的民国文献中的上海游记，在重重叠叠的游人叙述中，我看到了不同类型的城市地图，仿佛走过了很多地方的路，看到了很多已消逝的地标，感

受了很多类型的体验，最终拼凑起只属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的上海印象。

—

上海，在民国，在多数人眼中，是中国乃至远东的中心城市，是位列前茅的世界大都市。四面八方的人们纷至沓来，其中，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也有来自大城小乡的中国人。上海人口开埠时近 52 万，民国后猛增，1915 年增至 200 万，1930 年高达 300 万。此外，上海的各式水陆交通迎来送往，仅每年来沪的外国人就有约 10 000 人。^① 如此多的人口刺激了上海的旅游业，单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上海旅行指南便有 18 种之多。^② 于是，有了形形色色的上海行旅，也产生了难以计数的上海游记。

络绎不绝的上海游人，不仅身份、背景、动机不同，

^① 徐雪韵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9 页。

^② 彭梅：《城市意象展示与旅行者感知——以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旅行指南为中心》，巴兆祥主编《旅游与城市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86 页。

有政客、商人、学者、文士、学生，也有乡愚以及其他民间人士，有久居上海的上海通，也有短暂驻足的过客；有观光旅游的，也有工作、求学、考察或出于其他目的的，而且游览范围各异，遍及全市或聚焦一处。与之相应，大量的上海游记出现在当时的报纸杂志或专著上，如著名的《红玫瑰》（1924）、《良友画报》（1926）、《旅行杂志》（1927）常常刊载，其他的报纸杂志或专著亦间或有之。

漫游上海的人们，有不同的身份、背景或动机，也就有了不同的路线、焦点与体验。

作为上海常住民，徐蔚南、徐蘧轩、胡道静等上海通志馆成员是上海历史的发掘者，张若谷、徐国桢、林微音、郑逸梅、范烟桥、陈荣广等新旧两派文人是上海生活的描摹者，他们对上海往往具备深入的体验，能够从容不迫地观察与书写所在城市内里的精髓与脉动。其中，值得今人回顾的系列上海游记，见诸张若谷的《异国情调》、徐国桢的《上海生活》、林微音的《上海百景》等。

如梁得所，作为广东人，却长年在上海工作生活，任《良友画报》主编等。其在《上海的鸟瞰》一文中，记述了这样的一幅城市地图：黄浦滩—南京路—租界西南区—

城隍庙—北四川路，并对不同空间的功能加以确切的概括。作为都市生活的礼赞者，梁得所感叹上海老县城的保守，同时欣赏着租界现代化的活力，认为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都会，同时是情调深长的地方”^①。

作为上海的过客，为数极多，他们在短暂的驻足中，或随心所欲地游赏，或按部就班地考察，所作的上海游记，或事无巨细，或删繁就简，留下了初见者眼中的城市轮廓与棱角。其中，代表性的漫游或考察游记，见诸谢彬的《短篇游记》、杨应彬的《小先生的游记》、易健盦的《京沪漫游录》等。

如杨应彬，1934年尚为广东百侯中学的初中生，在游历上海后写成名著一时的《小先生的游记》。他以一个漫游者的姿态体验着上海的衣食住行，留下了这样的线路：亚洲饭店—南京戏院（黄金大戏院）—商务印书馆—闸北—大世界—红庙。作为十二三岁的学生，杨应彬感受到上海繁华的同时，也看到了外国人蛮横的姿态与不同阶层悬殊的生活。

^① 梁得所：《上海的鸟瞰》，《旅行杂志》1930年第4卷第1期。

又如石评梅，崭露头角的“五四”新文学家，1923年作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随团进行全国旅行，以考察教育为宗旨，写成《模糊的余影》系列文字。在《上海的一瞥》中，她展示了一条独特的考察路线：女青年会—中国女子体育学校—上海体育师范学校—沪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务本女校—第二师范学校—美术专门学校—商务印书馆。石评梅，作为来自北京的文学青年，却毫不留恋上海的繁华嚣乱，反斥之为一片闹声的沙漠。

此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众多外国人的上海游记。早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又译郭实腊）便几度经过上海，并著有《中国沿岸三次航行记》一书，内有上海的细致描述。之后，相关记载绵延不绝，蔚然大观。到民国，仅外国著名文人的上海游记，便有毛姆的《中国的屏风》、谷崎润一郎的《上海交游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村松梢风的《魔都》等，他们的文字往往带着某种预判，或惊鸿一瞥或浅斟细酌，在印证与比较中再现一个城市的别样风景。

如芥川龙之介，日本著名作家，作为大阪每日新闻

社特派员于1921年3月抵达上海。在其后写成的《上海游记》中，其记述的主要路线依次是：码头—东和洋行—四马路—湖心亭—城隍庙—天蟾舞台—小有天酒楼—徐家汇—码头。作为谙熟中国文化的芥川龙之介，敏感而多愁，认为“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即便是对于没有真正见过西洋的我来说，这里的西洋也难免有些不伦不类”。^①

以上的上海游记，几乎全出自知识精英的笔下。占了绝大多数的底层人物却是沉默的，但他们的生活，反被知识精英们所描绘。在很多上海游记中，南市、闸北以及租界的贫民窟是常常出现的场所，平民、苦力、乞丐等小人物也是重要的角色。知识精英们不仅观察，甚至代而言之，于是有种种的小人物游记，如程瞻庐的《村学究游沪报告》、赵梦龙的《阿土生游上海》、顾正学的《乡下人到上海游记》等。此类代言体游记，尤以乡愚游沪小说为突出，如赵仲熊的《乡愚游沪趣史》、贡少芹的《傻儿游沪记》、包天笑的《乡下人再到上海》等虚构了乡下

^① [日]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中国游记》，秦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31页。

人眼中斑斓的上海。但这些代言体游记,所折射的仍旧是知识精英的上海形象,并非处于霓虹灯外人们的真实行旅。

二

拥有同样背景的人们,往往拥有相近的城市印象,对于同一座城市,不同背景的人们就有了相差悬殊的城市印象。但人们所感知的城市,普遍存在着区域、节点、边界、道路和标志物等五种城市物质形态元素。^①对于游人而言,休闲娱乐空间最为引人注目,游记中频频出现的区域、道路、标志物方面的休闲娱乐空间,恰代表了民国上海最典型的城市意象。

区域,是一个城市内部中等以上的分区。民国的上海,有占据核心位置的租界,也有被其隔离开的南市、闸北、浦东等中国辖区,代表了两种异质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空间。正如刘建辉所言,上海简直是一个马赛克城

^①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7页。

市,除了上述两种异质空间外,在租界内部也并存着法租界、英租界和美租界三个各不相同的空间。^①

上海本身不断地扩张,其内部的区域亦不断变化,以至于宝山人的乡下人“决不承认自己是上海人,他们是道地的宝山人,要过了苏州河,才是上海县界;因此他们到南京路去,就算是到上海去的”^②。但在民国游记中,游人所游历的空间相对集中,主要是租界与老县城。其中,老旧的县城与现代的租界作为两个迥异的区域,几乎是人们的共识。老县城,尤其以城隍庙为核心,被贴上中国的、传统的、民间的种种标签,而租界,尤其是以南京路为中心,则代表着西方的、现代的、上层的。在租界内部,以外滩、南京路、霞飞路等为中心的商业娱乐区,静安寺路等租界西南角的高级住宅区等不同功能的区域也被梁得所等熟稔上海的人们所清晰辨识。

道路,是城市中的主导元素,也是游记中频繁出现的城市意象。自近代以来,上海传统的街、巷、弄多被现

① 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曹聚仁:《上海的成长》,《上海春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页。

代的马路所取代。尤其在租界，现代的马路成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无论是起初的大马路、四马路，还是改名后的南京路、福州路均名噪一时。

在民国游记中，众多的道路，如南京路、黄浦滩路（即外滩）、福州路、北四川路、霞飞路、外白渡桥、静安寺路等成为备受瞩目的所在。这些道路各具特色，迎合了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游人。其中，极度繁华的南京路，聚集了四大百货公司等著名的店铺，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外滩，耸立着不同式样的高楼大厦，文化之街的福州路，集中了上海的报馆、书局、旅馆等，娱乐化的北四川路，排列着众多的影院、舞场等现代休闲娱乐会场，还有中西合璧的霞飞路，纵览十里洋场的外白渡桥，安静闲适的静安寺路等。

标志物，是城市中一个相对突出的场所，常被用作确定方位的参照物。在上海，众多的标志物散布其间，既有现代的高楼大厦，也有传统的庙宇楼阁。对于大多数游人而言，日常休闲娱乐方面的标志物最为显著，其中，著名的有四大百货公司、大世界、城隍庙、龙华寺、青莲阁、天蟾舞台、大光明电影院、跑马厅、国际饭店、和平

饭店、春风得意楼，等等。

在众多的标志物中，名头最大的当属城隍庙与大世界，因其门槛低、花样多，故雅俗共赏，游人极多。城隍庙位处上海老县城内，供奉道教城隍等诸多神祇，1926年重修，常举行各种民俗活动，周边聚集了大量娱乐休闲商铺。大世界游乐场，位于法租界爱多亚路，1917年创办，内有中西雅俗各类娱乐设施。二者均是众多游人的必经之处，以至于当时流行“不逛城隍庙，不算到上海”“没去过大世界，等于没去过上海”等语。

除区域、道路、标志物外，民国游记中常常出现的还有黄浦江、苏州河（吴淞江）等著名的边界。黄浦江，作为游人进出上海的重要门户，是上海的重要边界。而苏州河，则横贯市区，是商业区与工厂区、市区与郊区的分水岭。此外，民国上海的城乡界线连绵不绝，“即使在1941年，仍旧可以在三四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被称为“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

界之一”^①。在黄浦江、苏州河、城乡分界线上，游人们体验着上海内外、租界内外、租界内部的多样景观，以及其后蕴藏的新旧、中西、阶层的融合与冲突。

三

民国的上海，作为规模宏大的现代都市，包罗万千，异彩纷呈，正如1935年西方人在《上海指南》中的描述：“令人惊异的悖论，难以置信的反差。漂亮，卑污，奢华；生活方式如此迥异，伦理道德那么不同；一幅光彩夺目的巨形环状全景壁画，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②在如此繁复的上海面前，无论久居上海，还是短暂驻足，大多数人所见到的只是上海的某一角落或层面，最终体现在游记中的，也只是少数鲜明而深刻的体验。有的体验着繁华与摩登，有的体验着贫困与堕落，更多的是兼而有之，在大量的惊讶、欢喜、沉重、

① 参见[美]墨菲(R. Murphey)：《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② 转引自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第3期。

厌恶中，隐藏着属于特定时代的若干立场。

上海，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融与冲突最剧烈的空间，尤其显著的是中西文化、社会阶层方面。在中西文化上，租界与南市有着强烈的反差，二者的内部同样如此，西式的大饭店、舞场与中式的酒楼、茶馆并列着，典型如法租界的霞飞路，中西两种式样的商铺泾渭分明地排列在东西两头。

在社会阶层方面，西方人与中国人，上层与下层，各有界限，反映在日常生活方面，如高级住宅与工厂棚户，大饭店与街头摊贩，西装旗袍与衣衫褴褛，均鲜明地对照着，也反映在空间方面，如南京路、城隍庙、福州路，分别代表了贵族的、平民的、混合的。

游人，很容易被一系列对比强烈的城市空间所吸引，继而被充斥着不同国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趣味的杂糅空间所刺激。

民国一代精英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民族主义、阶级理论的影响，很容易体验到上海空间内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如林语堂在《上海之歌》中淋漓尽致地痛斥上海是“东西浊流的总汇”：